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后现代性的起源

著 [英]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译 紫辰 合章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的起源

著 [英] 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译 紫辰 合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性的起源/[英]安德森(Anderson,P.)著;紫辰,合章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

(知识分子图书馆)

书名原文: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ISBN 978-7-5004-6244-6

I. 后… II. ①安…②紫…③合…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9779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每天出发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26千字

定 价 1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 问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 编 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焯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本书由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

2 总序

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

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

4 总序

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

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须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

6 总序

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年10月于北京

作者前言

这篇论文源于应邀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新作《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作序，结果写得过长不宜为序。不过，在单独出版本文之际，我并不想改变它的形式：在读它的时候最好参看曾经启发它的《文化转向》。虽说从不评论自己不喜欢的著作，但是，在过去，抵制因素一直是促使我发表评论的一个动因。知识上的钦敬是一回事，政治上的同情则又是一回事。这本小书所要做的与这些无关，而是去做我一直感到勉为其难的事情：表现一位思想家的成就感，有人可能认为，我与他之间缺乏充分的安全距离。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成功。但是，围绕詹姆逊的著作在总体上进行较大规模的争论早就应该出现，这次尝试至少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本书的题目有双重指涉。其最主要目的是，比起时下的见解，更好地从历史角度论述后现代性观念的起源：与习惯做法相比，这一论述力图更准确地把后现代性的不同源头放在它们的空间、政治和知识背景之中，更为注重后现代性观念发展的时候顺序（这也是谈论焦点）。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的观点才能得以完整表达，詹姆逊著作的独到之处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本书还有一个目的，尝试性地指出——作为现象而非观念的——后现代出现的某些条件。这些评论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以前对19世纪末现代主义产生前提的描述，另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围

2 后现代性的起源

绕这些问题争论热烈的当代文献。

在此，谨向柏林科学学院的帮助表示感谢，本书在那里完成，向那里出色的图书馆员致以谢意；同时向汤姆·马提斯（Tom Mert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我的学生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之意。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1. 利马—马德里—伦敦	(1)
2. 陕西—吴哥—尤卡坦	(5)
3. 纽约—哈佛—芝加哥	(12)
第二章 具体化	(15)
1. 雅典—开罗—拉斯维加斯	(15)
2. 蒙特利尔—巴黎	(25)
3. 法兰克福—慕尼黑	(38)
第三章 把握	(49)
1. 来源	(49)
2. 五个步骤	(57)
3. 后果	(69)
第四章 事后影响	(81)
1. 时期划分	(81)
2. 截然对立	(97)
3. 曲折变化	(113)
4. 范围	(124)
5. 政治	(131)

第一章

绪 论

1. 利马—马德里—伦敦

作为术语和观念，“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预设了“现代主义”的流行。与通常的期望相反，二者都诞生于遥远的边缘地带，而不是当时文化体系的中心：它们并非源自欧洲或美国，而是源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世界。“现代主义”一词的创造是一场美学运动，归功于一位尼加拉瓜诗人，他在危地马拉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他在秘鲁接触的一些文学作品。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于1890年开启了一股有自觉意识的、名为现代主义（modernismo）的文学潮流。他借鉴一连串的法国文学流派——浪漫派、巴那斯派^①、象征派，提出了脱离西班牙的“文化独立宣言”，在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追随者当中发起了一场摆脱受过去西班牙文学束缚的解放运动^②。在英语中，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主义”才成为一般用语，而在西

^① 巴那斯派：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诗歌流派，强调韵律、技术完善和描写准确。主要成员是勒贡特·德·列尔、邦维勒和苏里普·吕多姆。——译注

^② “Richard Palma”, *Obras Completas*, Vol. 2, Madrid 1950, p. 19: “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世界，如今有一股新的精神鼓舞了一群数量虽少、但却很骄傲和自负的作家和诗人，它就是现代主义。”

2 后现代性的起源

班牙语中，却早了一代人的时间。由此可见，落后地区率先开拓了先进的大都市所使用的术语。正如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liberalism）一词是西班牙人在拿破仑时代起来反抗法国占领时创造出来的，这个来自西班牙加的斯地区、带有异域色彩的用语，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流行于巴黎和伦敦的客厅。

“后现代主义”观念也是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语世界，比它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现早了一代人的时间。最早使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这个术语的人是乌纳穆诺^①和奥尔特加^②的朋友弗雷德里科·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他用这个词描述现代主义内部一股保守的逆流：回避难以遏制的抒情性挑战，抑制情感，极力追求细节和反讽式幽默，它最独到的特色在于它能够全新而真实地表现女性。德·奥尼斯把这个他认为昙花一现的模式与其后继者“极端现代主义”（ultramodernismo）进行了对比，在一系列正在创作具有普遍接受性的“地道的当代诗歌”的先锋派当中，极端现代主义强化了现代主义的激进冲动，将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③德·奥尼斯那本有名的西班牙语诗选，是按照这个方案编选的，于 1934 年在马德里面世，正值左派在西班牙共和国掌权，内战迫在眉睫。这本诗

①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作家、早期存在主义者，以写随笔和散文著称，主要作品有哲学随笔《人生悲惨感觉》、《基督教徒的痛苦》以及长篇小说《雾》等。——译注

②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形而上学，提出“生命理性的形而上学”一说，主要作品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群众的反抗》等。——译注

③ Federico de Onis,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Española e Hispanoamericana* (1882—1932), Madrid 1934, pp. xiii—xxiv. 至于德·奥尼斯对西班牙语世界的现代主义特征的看法，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马尔蒂和乌纳穆诺，见“Sobre el Concepto del Modernismo”，*La Torre*, April-June 1953, pp. 95—103. *Antología* 中有对达里奥本人精彩的综合描述，pp. 143—152. 内战期间，与乌纳穆诺的友谊限制了德·奥尼斯的看法，但他的基本观点可见于他为马查多写的纪念文章：“Antonio Machado: (1875—1939)”，*La Torre*, January-June 1964, p. 16; 有关他当时立场的回忆，见 Aurelio Pego, “Onis, el Hombre”，*La Torre*, January-March 1968, pp. 95—96.

选题献给安东尼奥·马查多 (Antonio Machado), 全面收入了“极端现代主义”诗作, 以洛尔卡、巴列霍、博尔赫斯和聂鲁达等人的作品为压卷之作。

德·奥尼斯提出的“后现代”风格的观念成为西班牙文学批评术语, 即便后来的作家很少像他那样准确使用^①; 但它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直到大约 20 年后,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下, 这个术语作为一个表示时期的范畴, 而非美学范畴, 出现在英语世界中。阿诺德·汤因比 (Arnold Toynbee) 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第一卷, 也于 1934 年出版。^② 他认为, 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股强大的力量, 共同塑造了西方世界的近代历史。然而, 从 19 世纪最后 25 年以来, 二者之间却产生了毁灭性的矛盾, 因为国际性的工业规模冲破了民族的束缚, 而民族主义本身的传播范围日见萎缩, 只限于越来越小和更难于独立发展的族群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这两种趋向之间的冲突引起的, 这明白无误地昭示: 民族力量无法自足的时代开始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在于发现适合时代的新视阈, 而这只能在超越了过时的民族—国家范畴、更高水平的文明中找到^③。这是汤因比在已出版的六卷本《历史研究》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 但这部著作在 1939 年之前还未全部完成。

15 年后, 汤因比继续出版该专著时, 他的世界观已发生变

① 这一用法的影响不限于西班牙语世界, 还扩大到讲葡萄牙语的巴西。考究很严谨的一个例证, 见 Bezerra de Freitas, *Forma e Expressao no Romance Brasileiro-Do periodo colonial a epoca post-modernista*, Rio de Janeiro 1947, 巴西现代主义可追溯到 1922 年圣保罗的 *Semana de Arte Moderna*, 在未来主义的影响之下, 主要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 (Mario de Andrade) 的破裂有关, 到了 30 年代后现代主义遭遇本土主义的反应: pp. 319—326、344—346。

② 阿诺德·汤因比 (1889—1975): 英国历史学家, 曾任伦敦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教授, 伦敦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 主要著作《历史研究》(12 卷) 发展了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译注

③ *A Study of History*, Vol. 1, London 1934, pp. 12—15.